

# 日治時期基隆街(市)人口職業結構 與地方參與

林佩欣\*

## 摘要

清領時期，基隆即具重要位置，但因受地形所限，發展頗為緩慢，清領末期，歐洲人船隻航行東亞逐漸增多，1860年，天津條約簽訂之後，基隆正式開為商埠，清廷陸續准許基隆各地開採煤礦。日治初期，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就軍事、交通及貿易上的考量，強烈說明基隆築港之必要性，隨著港口的興築與設施日益完備，基隆港的吞吐量也逐漸增加，直接與間接促進基隆地方產業的勃興。日治時期基隆的人口增加以社會移入為主，顯示其經濟條件之豐厚；產業則是以工、礦和水產業為主，以工業的產值最高，漁業和煤礦為兩大特色產業。產業團體的地方參與，則可以每年農曆七月舉行的中元祭典來考察。基隆的中元祭典主事人多是當地的商家，舉行祭典時則會有地方郡守和重要紳商參加，當時的中原祭典相當興盛，除了因景氣佳具經濟實力外，舉辦中元祭典時吸引之商機和買氣則為一大考量。

**關鍵字：**基隆港、漳泉械鬥、中元祭、職業結構

---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 一、前言

台灣民間傳統的迎神賽會始自於清代，至日治時期臻於極盛，日治時期民間的迎神賽會與清代最大不同，便是神明祭典和繞境的鋪張與虛榮。以基隆地區中元祭典為例，由於每年輪值的主普都不一樣，為了避免陣頭明年被迎頭趕上，輪值爐主者往往會賣力準備，除了極力向各郊行各團體鼓吹贊助外，贊助的各工商行號亦會積極投入，想用藝棚長閣及新鮮有趣的廣告方式爭奇鬥艷，趁機吸引商況大發利市。不僅主事者對祭典祭儀窮盡心力，也常有善男信女摩頂接腫到寺廟參拜，甚至總督府鐵道部還會因應祭典，臨時架起香客休憩及臨時售票處，更加開臨時班車以紓解人潮，必要時警署還得加派警察到各地幫忙的情形。會如此，原因與日治時期基隆地區工商發達有關，導致基隆地區每年中元普渡愈發奢靡，報導甚至記載「其奢華恆為全島冠」，<sup>1</sup>當時基隆各地方之商人，在中元祭典這個時候，甚至能夠大發利市，貿易金額可說是全年貿易大宗。

日治時期基隆區的中元普渡會如此奢華，與工商業發達有關，而當時基隆工商業之發達，又與煤礦的開採與基隆港的築港，帶來的龐大商機和人口遷入之故。日治時期，台北州內除台北市外，基隆街(市)和瑞芳庄為兩大人口移入中心，尤其是其中的基隆街(街)，人口移入相當快速，1897年，台灣人口為6,835人；1924年，行政區劃改為基隆市時，當地人口已達40,557人，至1943年，人口又增至77,045人，若再加上日人則人數更多。<sup>2</sup>

熱絡的商況和密集的人口，加上台灣民眾敬天畏神之本性，讓民間宗教活動在當地頗為盛行，宗教活動的盛行往往又吸引眾多人潮和商機，讓商家大發利市，參與活動的團體因而樂此不疲。職是之故，本文主在探討日治時期基隆港築港之後，基隆市之商況，及其與中元祭典之關係。

<sup>1</sup> 〈中元普施盛況〉，《台灣日日新報》，第9110號，1925年9月18日。

<sup>2</sup> 溫振華，〈日據時期臺北市臺人移入地分析〉，《台灣風物》，36卷4期(1986)，頁27。

## 二、港式成長與產業活動

### (一) 煤礦開採與基隆港築港

清道光年間，台灣道姚瑩在奏稟之「台灣十七口設防狀」中指出，大雞籠位置極高，可俯瞰全台，嶺下三面峰巒環列，中開大澳，東北一面向海，而澳內水深二丈有餘，可泊大商船數百艘；<sup>3</sup>當時，同安舉人林豪亦云，雞籠三面皆山，獨北臨海，港口似不若滬尾之緊要，一經體察情形，實較滬尾尤重，因滬尾口門雖寬，但兩邊沙線為累，雞籠無之，入口難易不同，<sup>4</sup>可見清領時基隆地區即具有重要位置。但因清領時期，台灣主要交通對象為大陸沿岸各地，雞籠地區因地理特性受地形所限，使它與島內外的交通發展頗為緩慢，而成為走私盛行的港口，也吸引西方大船進入，但也因為這樣，基隆東邊山群得以被探勘出蘊藏豐富的煤礦。台灣北部地質素來蘊藏煤、金及銅等礦產，尤其是基隆附近煤礦產量尤高，產量佔台灣九成以上，最早有開採煤礦的記載始於荷蘭人，隨後，因各國勢力集中東洋，加以船舶往來頻仍，各國開始對基隆的煤礦躍躍欲試。<sup>5</sup>

清領末期，歐洲人船隻航行東亞逐漸增多，基隆附近的煤礦為各國所垂涎，英國和美國之海軍皆曾經派員前來調查，並撰寫調查報告。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時，英艦曾進犯基隆，戰後，英國海軍中將戈爾頓來台勘查基隆煤層，認為基隆煤礦品質優良，並據此回報。1850年，英國駐北京公使要求清廷准許英人在基隆開採煤礦，惟被清廷所拒。清咸豐年間，美國水師提督比爾理亦抵台，派員調查基隆煤礦，回國發表公報，謀取煤礦。

1860年，天津條約簽訂之後，基隆正式開為商埠，成為淡水的副港，「滬尾海關正口，同治元年設。雞籠外口，二年開禁……兩口每年徵稅，約銀六萬兩，無定額。」<sup>6</sup>雖歐美列強要求開採煤礦的建議屢遭清廷反對，但民間私採盛行，因此1870年，清廷乃

<sup>3</sup> 鄧費周，《基隆市志·沿革篇》（基隆：基隆市文獻會，1954），頁22。

<sup>4</sup> 陳培桂，《淡水廳志》，卷7〈武備志〉（台北：成文書局，1983），頁156。

<sup>5</sup> 基隆市役所，《基隆市產業要覽》（基隆：該所，1939），頁59。

<sup>6</sup> 陳培桂，《淡水廳志》，卷4。

正式傳集山主、紳戶等有力人士議定章程，允許十二個地方架設七十個口開採煤礦，八斗子附近的礦坑也陸續公營開採；<sup>7</sup>之後，因開港關係船舶漸增，人口漸多，清廷陸續准許基隆各地開採煤礦，基隆港初期的發展與煤礦之開採有密切的關係。<sup>8</sup>

直至日治初期日軍抵台時，首任總督樺山資紀就軍事、交通及貿易上的考量，強烈說明基隆築港之必要性。他認為台灣位於日本南方，是南方海域制海權的要衝，為日本南邊門戶的重鎮，也是帝國的要衝，因此必須以基隆港為對南作戰的根據地，艦隊也可以此為基點。<sup>9</sup>過去台灣島內供船舶停靠的港灣有打狗、安平、淡水、蘇澳及基隆五地，除基隆外其餘皆灣內狹隘，只有基隆港，地勢稍微偏北，交通雖然較不方便，但比較起來算是台灣唯一的良港，只是東北信風時期，波浪侵入港內，船舶安全難保，而且港內水淺，大艦巨舶繫泊不便，是基隆港唯一較大的缺點，但若加以修築，可成為全台為一個良港。<sup>10</sup>另一方面，日治時期日人治台最高行政中心—台灣總督府即設在台北，最便利的出口港原為淡水，但淡水港挾帶泥沙淤積，港口功能漸失，而基隆與台北距離頗近，加以基隆、台北間鐵路修築之後，兩地可以直接利用鐵路交通，基隆港因而成為代替淡水港的最佳選擇。<sup>11</sup>

1896年3月，總督府決定自臨時軍費中，支出台灣縱貫鐵道及基隆築港的調查費十萬圓，並任命軍務局參謀長海軍少將角田秀松為委員長、總督府的文武官為委員，囑託石黑五十二、石橋絢彥兩工學博士，對基隆港沿海的潮流、深淺波浪、氣象及工事材料等進行調查。<sup>12</sup>當時兩位博士便認為，基隆港地理位置距離西方僅100多哩，位置也相當靠近中國大陸，以南可控制菲律賓、東印度群島

<sup>7</sup> 基隆市役所，《基隆市產業要覽》，頁59。

<sup>8</sup> 陳正祥，《基隆市志·概述篇》，（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54），頁73。

<sup>9</sup> 石阪莊作，《基隆港》（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17），頁83-85。

<sup>10</sup> 同上註。

<sup>11</sup> 江燦騰，〈日據前期基隆港市崛起與變遷之背景考察〉，《台北文獻》，直字第82期(1987)，頁169。

<sup>12</sup> 伏喜米次郎，〈基隆港築港に就いて〉，《グレート基隆》（基隆：新高出版社，1932），頁26。

及海峽殖民地、越南等人口稠密之消費地區，相當適合海運的發展，<sup>13</sup>由此遂決定了長時間的築港計畫，決議以基隆為軍商合用港，1899年正式動工，至1944年因二次大戰之故工程停頓。

基隆港的興築前後分五期，第一期為1899-1906年，目的在疏浚港區以為應急之需；第二期為1906-1912年，配合指定航線的行駛與台日間的聯絡；第三期為1912-1928年築港規模最大，目的在利用第一次大戰之機會奪取世界航線，工程費高達1,586萬8,000圓；第四期為1929-1935年，目的在增加船席與擴充倉庫吞吐量；第五期1936-1944年，目的在配合日本之南進政策，隨著港口的興築與設施日益完備，基隆港的吞吐量也逐漸增加。

## (二)港口貿易與產業活動

日治時期，日人總計五次築基隆港，先後延續45年，耗費4億6,185萬圓。1899年時，基隆港進出之輪船僅377艘，噸位不過32萬4,835噸；至1939年，基隆港進出之輪船增加至2,512艘，噸位總計1,1004,435噸。就貿易數額而言，1897年，基隆港總貿易額不過500萬圓；1912年，已經接近5,000萬圓，十五年間增加十倍。迨至1925年，基隆港之總貿易額已經超過2億5,000萬圓，較1897年增加53倍；1939年時，基隆港之總貿易額已經接近五億圓，較1897年時增加100倍以上。<sup>14</sup>

除卻基隆港築港之有利因素，當時基隆市位於海陸交通的要衝，原料、產品的輸出入非常便利，加上鄰近控制台灣政治經濟中心的台北，因此基隆產業相當發達。日治時期，基隆市產業的勃興，可以就工業、礦業、貿易等方面來考察，農產、林產和畜產因產值較低則不予討論。基隆市的產業額中，工業大約佔全台灣產額的六成，也是本市生產額的大宗，其次是水產業和礦業較有優勢，農林、畜產業則不甚興盛。

<sup>13</sup> 伏喜米次郎，〈基隆港築港に就いて〉，頁38。

<sup>14</sup> 陳正祥，〈基隆市志·概述篇〉，頁87。

表一 1933 年台灣各都市生產額比較表 (單位：円)

市名	農產	林產	畜產	水產	礦產	工產	合計
基隆	87,091	22,115	931,291	3,793,813	2,008,806	9,435,438	16,272,554
台北	1,129,119	10,223	311,636	246,085	22,848	24,025,368	25,745,279
新竹	870,972	14,242	213,569	16,548	—	3,819,989	4,935,320
台中	997,302	—	92,194	3,500	—	14,669,620	15,762,615
嘉義	570,223	10,504	401,228	10,426	—	2,496,297	4,488,678
台南	294,327	—	176,464	1,186,918	—	4,221,903	5,879,612
高雄	1,042,185	493,476	577,156	2,582,735	—	15,582,811	20,278,363
屏東	1,370,024	—	353,232	—	—	10,241,455	11,964,709

資料來源：基隆市役所，《基隆市產業要覽》，昭和 10 年度，頁 13。

1921-1938 年間，基隆各類產業生產總額中，以工業類產值最高產五成以上，其次則為水產業約 25%、礦業 15%，農林業類產值最低。

就工業發展而言，基隆市的工業是以食品原料為主體，主要項目有精米、肥料、製粉、味素、製果、製冰和造船等，因為日月潭水庫和基隆外港修築的關係，臨港地區設立電化會社，更增加大船渠的建設和火力發電所的建設，逐步擴充工業圈，1930 年時即突破了 1,000 萬圓。<sup>15</sup>

就礦業發展而言，基隆地區煤礦的開採雖始於清領時期，但大規模的開採是在日治之後，1897 年日人視察九份、金瓜石鑛山之後，<sup>16</sup>台灣總督府隨後發布「鑛業規則」，開挖金瓜石、牡丹坑、瑞芳等金礦礦場，與四角亭的煤礦礦場。之後，隨著日本南進政策的增強，開啟南支南洋之運輸航線，1907 年之後，日本開放四腳亭的海軍預備炭田，基隆地區每年的出炭量暴增，煤礦的出產達到空前，<sup>17</sup>1933 年以後，基隆所蘊藏的煤炭一年甚至可產 40 萬至 200

<sup>15</sup> 基隆市役所，《基隆市產業要覽》，昭和 14 年度，頁 35。

<sup>16</sup> 第 4535 號文書，〈九份金瓜石兩鑛山其他鑛業視察富田技手外一名復命書〉，《台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12 門殖產，15 年保存，1897 年 12 月。

<sup>17</sup> 基隆市役所，《基隆市產業要覽》，昭和 14 年度，頁 59。

萬噸。<sup>18</sup>

就貿易項目而言，基隆港築港最初，乃是由政府出資補助大阪航船、日本郵船等航商建立台、日交通網絡，稱為「命令航線」；後來又開闢「自由航線」，由各個會社自由競爭航行，航線的建立最初以台日或台灣本島沿岸的交通往來為主，後來陸續加入大陸華南、華北，以及南洋航線。<sup>19</sup>這些以基隆為起或迄點的航線，雖然大多是為了台、日間之交通而建立，但是台灣的茶、樟腦等輸往英、美、德等國，皆以基隆為主要之出口港，<sup>20</sup>使得基隆港的對外貿易相當驚人，船舶數量及運輸噸位不斷地增加。

基隆港第一次築港工程進行完成時，1903年起，貿易額即超越了淡水港，一躍而成為台灣最大的商港，20年代時，基隆港的總貿易額曾高佔全台一半以上，加以基隆地近台灣之經濟中心台北市，又是位於煤產區，更是開發台灣東部物資輸送的基地，基於以上優勢，因而逐漸成為全台最大的貿易港口，自取代淡水港興起之後，除極少數年分外，基隆港的貿易總額皆超過高雄港，而為最大港口。<sup>21</sup>

基隆港輸出貨品主要有烏龍茶、紅茶、包種茶，其次為煤炭、棉織物、乾魚和鹹魚、樟腦等。其中，紅茶受到錫蘭印度輸出限制之影響，1934年，輸出量已接近300萬圓，1937年，更高達588萬圓。因為茶的市場較廣，也較容易吸引顧客，假使栽培和製造方法得宜，前途十分受矚目。煤炭則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戰之故，使得需求量大增，戰後雖然炭價跌落，但後來則是因為台灣重工業和新興工業的發達而扶搖直上。基隆港輸入貨品主要則是大豆、硫酸、和菸草等。<sup>22</sup>輸出日本的貨品主要則是以台灣重要之作物，如米、砂糖，後來之芭蕉、樟腦、樟腦油、帽子、煤炭、鮮魚和鳳梨罐頭

<sup>18</sup> 入江文太郎，〈基隆の發展に資する人と物〉，《基隆風土記》（基隆：台灣日日新報社，1932），頁123。

<sup>19</sup> 蔣山，《基隆市志·港務篇》（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57），頁73。

<sup>20</sup> 吳熹，《基隆市志·商業篇》（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57），頁95。

<sup>21</sup> 溫振華，〈日據時期臺北市臺人移入地分析〉，頁27。

<sup>22</sup> 基隆市役所，《基隆市產業要覽》，昭和14年度，頁113-114。

等為主。

輸出日本之物產中，稻米的輸出是在日本領台之後，伴隨著農業的開發而興起的，該產業與砂糖成為共同的貿易品大宗。1900年，稻米的貿易額不過是 3 萬圓；但到了 1908 年之後，隨著縱貫鐵路的開通，台灣中南部的稻米可以從基隆港輸出，1937 年，稻米貿易總額即達到 8,260 萬圓。砂糖則是因為地理位置之故，主要自台中以北的港口輸出，1870 年時僅有 5,800 圓的貿易額，1926 年時達到 2,000 萬圓，1937 年時也有 1,970 萬圓。芭蕉則是因應日本母國的需要，而成為重要之輸出商品，1937 年貿易額為 660 萬圓。煤炭不用說，乃是因應軍需關係而成為重要之輸出貨品。<sup>23</sup>另一方面，自日本輸入基隆港的貨品，則以棉織物、絹織物為大宗，其次為鐵、乾魚和鹹魚，紙、木材、製帽原料等。<sup>24</sup>

日本領台初期，1897 年基隆港的總貿易額僅有 500 萬圓，但因為基隆港地理條件優越，1905 年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國內資本相繼投入台灣，加以位於後方地帶的台灣產業發達，當基隆港完成終點設備時，即成為台灣貿易的支配地位。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故，世界產業需求量大增，1924 年，基隆港的總貿易額就達到近 2 億圓；1934 年，日本為了健全滿州國之實力，大量從基隆港輸出軍需和台灣島內米、茶等貨品，受此激勵，基隆港的總貿易額大幅增加，達到 2 億 7,000 萬圓，1937 年，更達到 3 億 7,000 萬圓之多。<sup>25</sup>

就商業發展而言，隨著港口的興建，也帶動了基隆都市化的發展，1924 年實施市制，基隆稱為基隆市，轄區東至八斗子、西至蚵殼港、南到石硬港、北達仙洞。<sup>26</sup>日治時期之基隆乃是具有商貿功能之港市，台日貿易佔了基隆港總貿易額 80% 左右，對日出口的貨物值，依次為米、糖、樟腦等，而日本則對台灣輸入棉織物、紙

<sup>23</sup> 基隆市役所，《基隆市產業要覽》，昭和 14 年度，頁 114。

<sup>24</sup> 同上註，頁 114-115。

<sup>25</sup> 同上註，頁 118-119。

<sup>26</sup> 簡萬火，《基隆誌》，頁 125。

類等。<sup>27</sup>由於基隆港是台日貿易往來的主要門戶，因此來台日人居住於基隆的人數頗多，是全台日人比例高居第三位者，因清領時期基隆市區是沿著港灣南岸及旭川運河二岸發展，因此台人就集中在這些區域居住，而日人則沿著築港新填的港口東岸一帶居住，各自形成商業據點。就商業地域而言，日本商人主要集中在義重町、日新町等地，台灣商人則是集中在福德町，商業團體則有基隆商工會、基隆總商會、財團法人基隆公益社商工部，基隆市全市的商家戶數約佔總戶數的二成，商業振興與否對基隆市之發展影響甚大。

表二 1924-1941年基隆市重要生產總額（單位：円）

年代	農業	畜產	林業	水產	礦業	工業	合計
1924	90,609	74,303	16,576	5,496,234	1,198,442	9,415,316	16,291,480
1925	119,788	124,058	18,205	5,792,326	1,726,750	8,974,789	16,755,916
1926	162,117	185,302	16,399	6,207,955	1,881,852	8,820,675	17,214,300
1927	94,476	198,867	25,097	4,878,826	1,293,338	9,069,179	15,597,783
1928	102,168	954,085	18,262	4,802,318	1,433,433	9,555,970	18,866,236
1930	94,255	727,581	18,443	5,618,365	905,967	8,195,082	15,559,693
1931	73,553	579,232	18,939	3,709,690	822,398	7,347,095	12,550,907
1932	81,918	572,537	16,689	3,206,793	565,030	8,085,427	12,528,394
1933	87,104	693,866	22,115	3,871,740	757,078	8,301,905	13,733,868
1934	112,405	735,866	31,090	4,024,040	815,000	11,820,342	17,538,743
1935	141,661	860,053	24,258	5,358,547	842,922	12,228,083	19,455,524
1936	151,305	875,938	31,102	5,397,390	1,034,606	13,343,299	20,833,640
1937	154,577	974,261	38,399	5,331,471	1,116,180	16,986,812	24,601,700
1938	216,591	1,189,465	40,602	5,607,892	1,488,411	22,664,658	31,207,619
1939	291,673	1,643,694	46,053	969,109	2,535,275	24,965,544	39,173,204
1940	234,816	1,096,228	60,111	13,157,492	2,348,931	29,247,332	46,144,910
1941	186,251	869,378	56,234	11,319,615	2,804,764	17,105,643	32,341,885

資料來源：1924-1931年度《台北州統計書》。

<sup>27</sup> 吳熹，《基隆市志·商業篇》，頁99。

### 三、人口之增加與職業結構

1895 年日人領台時，改基隆為基隆支廳，隸屬台北縣；1896 年時，基隆市街部分人口為 9,542 人；1897 年廢基隆支廳，原轄四堡為基隆、金包里、頂雙溪及水反腳等辨務署，仍隸屬台北縣；1900 年，基隆市街部分人口為 12,164 人。1905 年，總督府以勅令第 157 號發布「台灣臨時戶口調查部組織規程」，進行第一次臨時台灣戶口調查，就戶口調查結果看來，基隆市(街)的人口大致而言是逐年增加的。<sup>28</sup>

當時之基隆市管轄區域為仙洞、牛稠港、石硬港、田寮港、大水窟、大沙灣、社寮、深澳坑、八斗子、獅球嶺、大武崙、蚵殼港、內木山、外木山、大竿林、基隆嶼、棉花嶼，及彭佳嶼等地<sup>29</sup>。1906-1919 年間，台北州除台北市外，最大的淨遷入區就是基隆街(後改為基隆市)和瑞芳庄，台北市佔淨遷入人口的 53.26%，基隆街佔 31.34%，瑞芳庄佔 15.40%，其餘的街庄接成淨遷出，此時期台北市、基隆街和瑞芳庄是台北州內人口移入的中心。<sup>30</sup>

日治之前，基隆為一漁村，發展遲緩；日人領台初期，人口僅為 7,000 多人，但基隆港進行築港工事後，加上市區整理之實施與港市之發展，人口逐年增加。1905 年，人口增加一倍，為 1 萬 4,000 人，尤其是煤礦和水產業更加發達後，因為貿易量的增加，人口也跟著激增。<sup>31</sup>1910 年，基隆市人口為 16,911 人，1916 年末為 18,810 人，<sup>32</sup>1920 年時為 47,921 人，1930 年時為 74,525 人，1940 年為激增 105,084 人。

<sup>28</sup> 石阪莊作，《基隆港》(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16)，頁42。

<sup>29</sup> 詳見《台北州統計書》郡市管轄區域表。

<sup>30</sup> 溫振華，〈日據時期臺北市臺人移入地分析〉，頁10。

<sup>31</sup> 伏喜米次郎，〈基隆市大觀〉，頁81。

<sup>32</sup> 石阪莊作，《基隆港》，頁42。

表三 1924-1941年基隆市人口統計表

年代	戶數	男生數	女生數	人口總計
1924	6,384	13,897	12,148	26,045
1925	15,037	33,396	29,923	63,319
1926	15,489	34,535	31,471	66,006
1927	15,638	34,694	31,964	66,658
1928	15,638	35,996	32,863	68,859
1930	17,016	39,387	35,138	74,525
1931	17,670	40,904	37,776	78,680
1932	18,163	41,622	38,768	80,390
1933	18,481	42,464	38,979	81,443
1934	19,280	43,562	41,088	84,650
1935	19,841	45,352	42,048	87,400
1936	20,357	46,729	42,901	89,690
1937	20,934	48,093	44,835	92,928
1938	21,280	49,358	45,996	95,554
1939	21,860	51,485	48,697	100,182
1940	22,961	54,374	50,710	105,084
1941	23,438	55,278	51,245	106,523

資料來源：1924-1941年度《台北州統計書》。

基隆市人口的增加以社會增加為主，日治時期台北州淨遷移率以基隆街遷入率最高，可由職業結構及相關因素來加以探討。近代都市的整備是各種產業集約的結果，伴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發展，生產等各種關係和交易過程的複雜化，都市住民的職業也多樣化了起來，並且，人口可說是產業的基本要素之一，為了解各種產業和經濟生活的變化，就必須討論人口的職業構成，也可理解都市產業特性的重要意義<sup>33</sup>。日治時期的基隆產業，以工、礦和水產業為主，以工業的產值最高，而漁業和煤礦則是基隆的兩大特色產業，由1920年基隆街人口職業表，可以窺知其經濟活動。其中礦業、工業、商業與交通從業者，百分比各在14%-18%之間，雜業人數也達4.65%，職業結構相當均勻。<sup>34</sup>

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日人大力加強礦業開採及工業生產，

<sup>33</sup> 基隆市役所，《基隆市產業要覽》，昭和10年度，頁17-18。

<sup>34</sup> 溫振華，〈日據時期臺北市臺人移入地分析〉，頁10。

尤以食品、化學、金屬及機械器具工業生產為主，由戰爭而引發的商業需求，也使基隆的商業活動日趨繁榮。各町之中人口密度相差懸殊，福德町人口密度最高每公頃達 1,117 人，旭町為 906 人，高砂町為 876 人，玉田町為 870 人，元町為 514 人，而綠町和曙町每公頃人口則不足 10 人。<sup>35</sup>要之，基隆之人口分布最集中於福德町、旭町、高砂町、玉田町及元町，亦即港口南端一帶。

當時，由於基隆的工作機會較多，也吸引了許多外地的青壯男子到此地討生活，形成外來人口大量移入的情形。而基隆福佬語諧音「加人」也曾流傳一時。

表四 1924-1941 年基隆市各戶數職業別

年代	官公吏	自由業	農業	商業	工業	漁業	勞動業	雜業	無業	總計
1924	490	849	721	2,293	428	806	5,148	3,020	86	14,111
1925	426	682	757	2,664	498	868	6,965	2,130	47	15,037
1926	714	388	742	2,435	599	833	6,781	2,929	68	15,489
1927	657	922	717	2,504	613	889	8,327	978	31	15,638
1928	889	632	633	2,645	832	871	7,617	1,530	253	15,902
1930	766	1,089	608	3,081	648	930	7,846	1,554	494	17,016
1931	1,094	668	605	3,135	792	1,075	8,223	1,498	580	17,670

年代	官公吏	自由業	農業	工業	礦業	商業	水產業	交通業	其他	無業	總計
1932	1,386	673	875	719	565	3,093	1,260	532	8,826	234	18,163
1933	1,508	926	870	922	722	3,552	1,232	1,123	6,350	1,376	18,481
1934	1,623	960	861	937	540	3,639	1,418	1,212	7,862	228	19,280
1935	1,667	1,503	734	777	840	3,028	1,567	1,267	8,225	221	19,829
1936	1,849	1,477	742	896	994	3,079	1,539	1,159	8,460	149	20,344
1937	1,868	1,636	871	1,078	1,081	3,180	1,785	844	8,150	428	20,921
1938	2,218	3,825	730	844	921	2,827	1,853	731	7,198	119	21,266
1939	2,181	3,763	732	1,033	1,081	3,099	1,892	910	6,984	109	21,787
1940	2,329	3,899	723	1,127	1,344	3,337	2,152	1,390	6,532	111	22,950
1941	2,505	2,066	677	1,878	2,191	3,656	2,096	1,732	6,556	63	23,420

資料來源：1924-1941 年度《台北州統計書》。

<sup>35</sup> 陳正祥，《基隆市志·概述篇》，頁91。

#### 四、產業團體的地方參與

產業團體的地方參與，可以每年農曆七月舉行的中元祭典來考察。舉辦中元祭典之用意主要乃是為超度亡魂，特別是無主孤魂，基隆中元祭典之來源，相傳是因早期許多移民客死異鄉無法安葬，成了無主孤魂，當地百姓基於懼厲作祟的心理，按照習俗舉行普渡，之後，隨著移入人口增加，漳、泉籍移民時起爭鬥，漳人早入基隆，因此佔有港口附近的低平地帶，居住在靠海的坎仔頂，泉籍進入較晚，轉向港口以南的山區開發，大致以獅球嶺為界，雙方因土地開墾與境界劃分之間問題輒起衝突。<sup>36</sup>漳、泉爭鬥最嚴重的是咸豐三年 8 月，慶安宮一和尚一馬當先，率領漳人至魴頂與泉人相鬥，死傷甚多，至咸豐十年 9 月止，漳、泉移民間的械鬥共發生三次。傳說漳泉械鬥之後，漳人 105 人為泉人所殺，由慶安宮之住持撿拾白骨集葬，後人為追念這 105 名犧牲者，於是為之建祠奉祀，每年普渡，久之漸成慣例。<sup>37</sup>

後來，基隆地方仕紳為革除械鬥陋習，超度死難孤魂，以及打破漳、泉祖籍意識，即以「字姓」為單位，每年輪流主普，超度亡魂。當時十一姓包括：張廖簡、吳、劉唐杜、陳胡姚、謝、林、江、鄭、何藍韓、賴、許等姓，以抽籤決定每年輪值主普順序。1855 年之後，金包里（今金山、萬里）、雞籠（今基隆市中正、信義、仁愛、安樂、中山五區的部分區域）、三貂（今貢寮、雙溪二鄉，瑞芳鎮一部分）、石碇（平溪鄉、瑞芳鎮、基隆市七堵、暖暖二區）等地居民，共同參與普渡，也就是所謂「金雞貂石」之由來。<sup>38</sup>中元祭雖然主要由十一姓輪值主普，但整個祭典儀式是以慶安宮的「四大柱」為中心，即是祭典中的主普、主會、主壇、主醮四個部分，據說是依道教醮祭的儀式，建立醮壇設祭時，設立道壇於廟內稱為內壇，並另外在舉行祭拜活動的區域，分天、地、人、鬼四門

<sup>36</sup> 石坂莊作，《基隆港》（台北：台灣日日新報社，1917），頁11。

<sup>37</sup> 廖漢臣，〈基隆普渡調查報告〉，《台灣文獻》，15卷4期(1964)，頁124。

<sup>38</sup> 陳燕如，〈中元普渡與政商之間—日據時期基隆地方領袖的發展〉（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8），頁76-77。

建立四個醮壇，稱為外壇，即是俗稱的四大柱。<sup>39</sup>這個四大柱名稱後來在中元祭典則衍稱為主會壇、主醮壇、主壇、主普壇等，這四大柱其實是在中元祭典中各負責一個較談的祭典活動，依各壇名稱所示，協助整個祭典活動的進行，分別負責中原祭典的會務、醮事、壇務及普事等。<sup>40</sup>

基隆的中元祭典主事人多是當地的商家，<sup>41</sup>舉行祭典時則會有地方郡守和重要紳商參加。<sup>42</sup>

就七月一箇月間，本島人一邊，稱為慶讚中元，內外祭典最繁盛之期，向來各地方普通商人，每遇此期間所有買賣金額，比之正月一箇月間寧有過之而無不及之處，即屬全年中貿易之大宗。由經濟言之，舊中元祭典，關係商業至大，而況近今一般景氣不佳，生意不振，凡所以招徠顧客鼓舞熱鬧者，亦加努力。<sup>43</sup>

日治時期商業團體與宗教密切結合，原因之一當然是因為景氣佳，商家有錢資助宗教活動，藉著參與之便不僅可以打響商家知名度，還可藉機宣傳商品，另一方面，有人氣就會聚集買氣，趁著宗教活動時的人潮，順便可發筆小財，這也是日治時期基隆的中元祭典如此蓬勃興盛之故。因此，每年基隆地區參加神明慶典或中元祭典陣頭遊行的隊伍，除了傳統的寺廟子弟陣出團，或主普、讚普外，不乏市區各商號盛情參與。如《台灣日日新報》上所報導的，「本島人運送店聯合團，自賽會前一天起計 5 日，將慶安宮前殿屋上臨時點電火百餘盞，夜間如白晝大放光彩。」<sup>44</sup>商家盛情參與祭典之程度，不僅在陣頭、鏞旗或行頭上極盡奢靡，為求誇示不僅有廣告

<sup>39</sup> 基隆市政府民政局，〈雞籠中元祭的變遷〉，《雞籠中元祭》（基隆：基隆市政府，1996），頁5。

<sup>40</sup> 陳燕如，〈中元普渡與政商之間：日據時期基隆地方領袖的發展〉，頁157。

<sup>41</sup> 〈慶安宮中元柱首決定〉，《台灣日日新報》，第10189號，1928年9月1日。

<sup>42</sup> 〈基隆聯合祭典紀盛〉，《台灣日日新報》，第7544號，1921年6月5日。

<sup>43</sup> 〈舊中元祭典中新舊各有所主張為文化與經濟不合〉，《台灣日日新報》，第10539號。

<sup>44</sup> 〈賽會紀盛〉，《台灣日日新報》，第6441號，1918年5月29日。

宣傳，還有各種噱頭。例如某年的祭典，田寮港地方的煤礦單位，就模擬機器火鼎、炭坑及探勘場的樣子，模仿燃燒炭火煙火瀾漫樣子繞境，但又標榜這些煙火是用青草生柴製造而成，純粹博君一笑用。<sup>45</sup>

另一方面，主辦單位為求祭典豐富有趣，往往又傾其全力，甚至舉辦陣頭比賽，讓參加者更加瘋狂投入陣頭競賽，除了暗中較勁、打聽對方行頭，還有因為沒有得獎而不服氣的狀況。除贊助普渡事宜之外，負責陣頭的爐主要出陣之前，也會事先向各郊行團體鼓吹贊助，希望能夠錦上添花大勝往年，當時出陣頭的即有東瀛郊及本島人運送店團、水產仲賣團、商船組、郵船組、市場魚菜商等，他們常會利用各種藝棚長閣和新鮮有趣之廣告法，以求出奇鬥勝。<sup>46</sup>

除了排場出陣，大小陣頭也會爭奇鬥巧，甚至還有因為自家所組裝的藝閣未獲一等賞而不服氣的狀況。報紙便曾論及，某年中元祭典，由米穀商團所裝設之歷山耕田、托拐弄仙姑兩故事，與菸草商團之菸草期同佔優勝，菸草團因為未獲一等還頗不服氣，當時大會還對各個賽會陣頭有一些評論，認為菸草團的陣頭平淡無奇云云。<sup>47</sup>還有報導評論優秀且廣告創意十足的陣頭，認為基隆港浮船團所裝設之東坡遊赤壁，閣上造木舟丈餘，首尾有兄弟數名裝作舵公，間置彩幕，幕中擇妙妓飾蘇東坡，頗費苦心，惜乎無配以夜景、舉酒酌客、誦明月之詩，難以點出等言論。<sup>48</sup>參加宗教慶典的另一個目的，當然是因為商家可以藉機打廣告，宣傳自己的產品。例如：某年台北麥酒會社即裝飾自動車三台參加繞境，沿途灑佈麥酒兌換卷 1,000 張，每枚可兌換麥酒一瓶，為助餘興兼擴張賣酒等等。<sup>49</sup>

日治時期基隆地區的中元祭典，因為過於鋪張，儀式內容被認為是迷信，高溫曝曬祭品也被認為不衛生，而引起日人的譴伐，甚至認為是不文明的行為，卻也無法禁止民眾對祭典的熱烈參與。即

<sup>45</sup> 〈賽會紀盛〉，《台灣日日新報》，第6441號，1918年5月29日。

<sup>46</sup> 〈基隆媽祖賽會先聲〉，《台灣日日新報》，第6429號，1918年5月17日。

<sup>47</sup> 〈基隆聯合祭典紀盛〉，《台灣日日新報》，第7544號，1921年6月5日。

<sup>48</sup> 〈基隆迎神雜觀〉，《台灣日日新報》，第9364號，1926年5月30日。

<sup>49</sup> 〈基隆媽祖繞境先聲〉，《台灣日日新報》，第9356號，1926年5月22日。

便是在經濟不景氣的狀況下，參加祭典的人仍然相當踴躍，鋪張的程度不亞於平常，1921年，正值世界經濟普遍不景氣的時候，基隆當年的煤炭產量同樣不景氣，街頭甚至有許多商店倒閉，街庄役場徵稅之成效也只有平常時候的十分之一，是日本領台二十年以來基隆最不景氣的時候，但當年的中元祭典仍然相當熱鬧，甚至比往年還更奢華，而被日人輿論評為「貽笑文明」，可見當時基隆人對中元祭典的熱中程度。<sup>50</sup>

## 五、結論

中元祭為基隆地區每年盛大之祭典儀式，發源之因固然是泉漳械鬥事件，以及傳統漢人普施孤魂野鬼的習慣，但沿襲至日治時期祭典會如此變的如此盛大，原因頗多，其中之一即是與基隆港築港所帶來的龐大商機所致。因基隆港築港，為基隆市帶來許多貿易額和就業機會，發展許多中小企業或商行，民眾也因積有餘資，得以用來崇信神鬼，以求來年更加大發利市。

基隆市原本是個漁村，人口數也不多，日治之後受到基隆港築港的影響，以及煤炭開採的關係，人口增加相當迅速，成為台北州之內人口移入最多的都市，產業的發達也帶來商機，人口的職業結構多以工礦、水產為主，也成中元祭典主要的參與者。

---

<sup>50</sup> 〈貽笑文明〉，《台灣日日新報》，第7626號，1921年8月26日。